

我所了解的詩人穆旦

● 孫志鳴

今年2月26日，詩人穆旦已經離開我們整整21周年了。我總想寫點甚麼將當年和先生的一段交往記錄下來，並非奢望能傳諸久遠，主要是想使自己困頓的心靈能得到些許安慰。在夜深人靜之際，我從書堆裏翻出了二十多年前先生寫的一沓兒書信，細細研讀着，那些塵封的往事便重現眼前。說實話，許多年來我不敢輕易開啟這扇記憶的閘門，生怕自己的淺薄褻瀆了先生那正直、勤奮、才華橫溢、由於不斷探索而永遠處於探索苦惱中的形象。一個偉人曾說過，整理亡友的文稿如捏着一團火。而我讀着先生這些書信時，卻像抱着一塊冰！因為它們又把我帶回了那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絕望的年代裏。

我和先生相識，既是一個偶然機會，更有點必然的緣分：我喜歡詩，而先生又是個詩人和詩歌翻譯家。

在內蒙古插隊時的那些漫長的冬夜裏，我們幾個知青常常把油燈挑亮，圍坐在炕上朗誦普希金(Aleksandr S. Pushkin)的詩。時間久了，我幾乎能把《十月十九日》、《青銅騎士》以及《歐根·奧涅金》中的許多篇什背誦如流。到了白天，有時我們又站在房頂

上衝着蒼天和荒野高聲吟詠……普希金的詩在那些年月裏像甘泉一樣滋潤着我心靈的沙漠。因此，我在崇敬普希金的同時，也深深地感激他的譯者——查良鏗先生。

1973年秋天，命運拿廣大知青開了個玩笑：停辦了多年的大學忽然轟轟烈烈地要招生了，報名、推薦、考試，煞有介事似的，令人忙得不亦樂乎；到頭來，半路跳出個張鐵生——交白卷的上大學！大家心都涼了。我「名落孫山」之後，一天，我們村來了個知青，叫查英傳。在我得知查英傳的父親就是查良鏗之後，我非常興奮。

小查問道：「你怎麼會認識我父親的？」

「當然認識，」我開玩笑說，「是通過俄國詩人普希金的介紹認識的。」

「可我父親以前是搞英語的，——你現在還讀那些老古董？」小查問。看來，小查對他父親的了解的確不多。然而，我決心通過小查實現拜見普希金譯者的宿願。

1974年春節剛過，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我跑到南開大學東村，敲開了查良鏗先生的家門。先生給我的第

一個印象是很樂觀。當他非常認真地聽我講完組裏的知青是如何爭相傳抄普希金的詩，並從中得到安慰，現在要向譯者當面致謝時，他兩眼放光，激動地搓着手，並像一個不失赤子之心的孩子似的朗聲笑了起來。寒暄了幾句之後，我們開始談普希金、談詩。先生說：

普希金詩歌的最大特點是溫柔敦厚。在他的詩裏，快樂是活人的快樂，悲傷也是活人的悲傷。不像有的詩人——如雪萊——那樣，寫起哀歌來呼天搶地般慟哭，彷彿寫過詩後真會死去一樣……普希金有些短詩不太惹人注意，其實它們都非常俏皮，極富人情味兒。

先生當下就背誦了一首普希金的小詩《摘自致B·II·葛爾恰科夫函》。

幾天後，應先生的要求，我拿了自己的幾首詩向他請教。現在只記得有《黃昏》和《車過八達嶺》兩首，前者是寫景的鄉村牧歌，後者則側重抒情。先生讀了兩遍，說：「看得出你是在摹仿普希金的手法，但你還沒有把握住他的精髓——詩首先應該真實，特別是心靈的真實。從你介紹的塞外生活中，我體會不到《黃昏》中描寫的閒情逸趣……」他舉了幾段恩格斯論述文學應該真實的話之後，又說：「只有忠於生活的人，才能抒發真實的感情；同樣，感情越真摯，對生活的體會才可能越有新意，寫出詩來自然有深度。」他特別強調說：「寫詩最忌故作多情，否則就好比把感情當成一堆劈柴，你把它點燃了，又脫下褂子來將它扇旺，一邊扇，一邊還大喊大叫。這不但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甚至會對你的舉動感到莫名其妙。」

在以後的日子裏，先生有選擇地

借一些他剛譯出的詩給我看。先是拜倫的《貝波》、《柯林斯的圍攻》等，後來便是奧登、斯本德、葉芝、艾略特等一大批英美現代詩人的作品。借助先生寫的那些精辟的、見地獨到的解釋，使我讀後受益匪淺。接連好幾年，一到冬天回家探親，我都要隔三差五去先生家請教，而先生也樂於將他剛剛譯出的詩稿讓我拿回家去看。他常說：「你是第一個讀者；不過，別丟了，也不要再發展第二個讀者。」在那個年代裏，如果被當局發現傳抄這些東西，可是罪莫大焉呵！遭批鬥、坐牢，甚至斷送一生的前程。我把詩稿拿回家後便將它們抄在本子上，然後再藏起來。每次還稿時，先生總要與我交談感想。

一次，先生給我講了一首帕斯捷爾納克(Boris L. Pasternak)的俄文詩歌後，說：

帕斯捷爾納克的風格和普希金不一樣，倒可以稱得上是蘇聯的艾略特。現代派詩歌的流派很多，表現手法也很不相同，但是有一點，這些詩人都力圖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上把握人的內心世界。如果以作品的深刻性來衡量，傳統的詩歌就顯得有點遜色了。至於中國的自由體詩，人們不感興趣，最主要的原因是膚淺，形式倒是次要的……但也應該看到歐美現代派詩人在追求深刻的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晦澀。我以為詩歌和散文有許多不同處，其中之一是詩可以晦澀，而散文卻不能。不過經院味太濃了，就等於把詩鎖進了象牙塔，和那些膚淺的詩一樣不被人們所接受。只是有點區別：一個是難以接受，一個是不願接受……如果能從普希金和艾略特的風格中各取所長，有

機地揉合成一體，倒未必不能成為今後中國新詩的一條探索之路。

從先生晚年的詩作，如《冬》、《停電以後》、《老年的夢囈》等篇什中，便可以發現他正在做這種嘗試。它們已經減少了先生早期作品中的晦澀成分，而增加了溫柔敦厚的情調。

在認識先生兩年之後，他才將自己早年的詩集《旗》拿給我看。到這時我才知道他的筆名叫穆旦，是將姓拆開來又換了一個諧音字。我讀了之後，他問：「喜歡哪一首？」我說：「《詩八章》。雖然不能徹悟個中三昧——也許，本來就詩無達詁——但讀了一遍還想讀，啞摸一次就有一新的體會。我還特別喜歡詩中那極富彈性的語言……」

隨着我們之間了解的日漸深入，先生又把他自己剛寫成的詩也拿給我看。我記得有《秋》、《冬》和讚美友誼的詩。這些詩都是寫在被裁成兩半的16開白紙上。每次看完，他都忘不了叮囑一句：可千萬別說出去。現在回想起來，他用小紙條寫詩，恐怕是為了方便隨時銷毀的緣故吧。

先生也常對我談起詩壇上的人物。記得有一次提到艾青時，他說：「在緬甸和日本人作戰的那些年月裏，喜歡讀艾青的詩篇，如《手推車》。現在就無此興致了，也許是情隨境遷，感慨繫之吧。」關於徐志摩的詩，他認為華麗有餘而深刻不足，不喜歡。他還談過對七月派詩的看法，特別是創作方法上的分歧……先生直言不諱的性格在談及帕斯捷爾納克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雖然他極口稱讚帕氏的詩歌，但對其獲諾貝爾獎轟動一時的小說《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卻不以為然，說只讀過前半部分，覺

得太枯燥無味，就沒再讀下去。先生在詩歌翻譯上主張神似，他一再表示在以後的翻譯中要更「破格」。他不滿意當時已經出版的《唐璜》中譯本，認為沒有把原著的俏皮譯出來，所以讀了感受不到原著的美。評價別人直言不諱，對自己也如此。他譯完了艾略特的《荒原》後，借給我的卻是解放前出版的趙蘿蕙的譯本。他解釋：「你還是看看這個吧，我譯不過她。」

先生對生活的看法較之對詩歌的看法，也許能給人以更多的啟迪。記得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我裹一身塞外的風塵，踏着高音喇叭裏播出的刺耳的「批林批孔」的叫喊，來到了先生家裏。圍坐在爐邊，先生雙目微閉，聽我講插隊生活，講精神上的苦悶，講陌生的地方和更陌生的人。我告訴他，為了能盡早被選調，我曾和組裏的另一個知青劉承祺——也是先生的一個忘年交——秉燭大幹數日，好不容易編造出一個粉飾太平的小歌劇。本想拿它當敲門磚與縣委宣傳部去拉拉關係，不料這塊石頭扔出去後沒有引起任何反響，甚至連個水花都未濺起來。先生聽了之後，睜大眼睛，非常坦率地說：

你們都有一些文學意趣和才能，但光有這些並不意味着將來就可以幹出真正的事業。問題的關鍵是你們要學會駕馭自己的才能……詩歌是詩人心靈對生活的最真實的反映，如果你們把它變成敲門磚，就無異於用才能毀了自己。因為你已經失掉了人格。

先生停了一會兒，又說：

無論到甚麼時候、在任何環境中，你都要耐得寂寞。那些執着於自己信念

的人總是寂寞的。歷史可能有這樣的誤會，才華橫溢的人也許會終生默默無聞，一些不學無術的笨伯反而能煊赫一時，而且顯得煞有才華。這是時代的、也是歷史的悲哀。

在以後的來信中，先生又對我們這些長期在千里之外插隊的年輕人的所作所為表示理解。他說：

但我至今仍然認為，人是只能或為理想而活着，或為物質享受而活着，享受拿到手，可能淡而無味；只有理想使生活興致勃勃。當然如果太沒有物質水平，那也會令人喪氣的。人就是經常在矛盾中求出路的，這兩方面的矛盾經常不是從這面、就是從那面來壓你，使人永遠不太滿意。

在說到他自己時，先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談到技能，大概(如)在水中游泳，以寫詩者的技能來競爭，該是最吃虧的事。因為心靈是個大包袱。

先生在給我和承祺的信中諄諄告誡我們要多積累知識，不可荒度光陰。正像他要求寫詩要深刻一樣，在做人上則強調「力求在一個方面深入一下，將來遇上機會，就可以用上了」。諸如此類的教誨還有很多，當時不覺得怎樣，在以後的生活中我們才感受到它們的分量和意義。

1976年初，正是中國的命運變幻莫測之時，先生右腿骨折，產生了一種「餘年可數」之感。他在那年3月31日的信中寫道：「我近兩月……特別苦惱，整天昏昏沉沉，躺不是，坐也不是。抽空也看些書，讀點舊詩。很愛

陶潛的人生無常之歎。」先生還抄了一首《歸田園居》其二。現在，當讀到「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時，我忽然記起有一次先生把奧登的《悼念葉芝》交給我，順便說了一句：「你是它的第一位讀者，但願不是最後一位讀者。」

在那個絕望的年代裏，苦悶和不安是難免的，但不能動搖先生的信念。平靜下來後，他往往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先生有個很了不起的翻譯計劃：在整理好《拜倫詩選》，完成了大量英美現代派詩人作品的翻譯和解釋之後，把普希金的五六百首抒情詩(其中百多首未發表過)重新改譯和抄出一遍，並「力求每行都押韻」。他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在1976年6月5日給我的信中寫道：「這兩個多月，我一頭扎進了普希金，悠游於他的詩中，忘了世界似的，搞了一陣，結果，原以為搞兩年吧，不料至今才兩個月，就弄得差不多了，實在也出乎意料。」今天重讀這些信，我不禁又想起了當年先生伏在孤燈下，專心致志辛勤筆耕的情景。他彷彿一點也沒聽見窗外「反擊右傾翻案」的叫喊聲，真像「忘了世界似的」。

今天，當先生的譯著接二連三出版的時候，當我讀着那些優美的詩句而激動得拍案的時候，我常想：「這些美妙的作品，何以能在那樣一個令人絕望、窒息、恐怖而混亂的年月裏產生呢？」也許，有人會說他勤奮。是的，每次當他把抄寫工整的、厚厚的手稿交給我時，我都這樣想過。也許，有人會說是才華和興趣使然。沒錯，才華和興趣兩者相輔相成，它們確能使某些人在從事一些看來艱苦的、枯燥無味的工作上廢寢忘食且樂此不疲。但在「四人幫」時期，先生的

勞動一旦被當局發現，不僅本人會橫遭不幸，而且還要禍及家人，這正是令先生最痛苦並時時自責的事情。我認為先生之所以敢冒這麼一個冒不起的風險，是因為他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正像他多次對我提起：「中國總有一天還會需要知識，需要藝術，自己『辛酸的工作不白受苦』，……。」同時，他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他曾把裝有譯稿的小皮箱交與最小的女兒保管，並叮囑：「你最小，也可能等你老了，它們才有出版的希望。」我以為，先生真正達到了無私無我的境界，稱得上是中國的脊梁。

先生對祖國的感情之深，是我這枝筆所不能表達的，只可意會而已。有一次，我對先生已經在美國取得了學位、有了舒適的生活，又偏要回國受這份罪（1953年回國，1958年被錯判為「歷史反革命」，受勞動管制，降職降薪）表示非常不理解。先生說：「國外世態炎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非常冷漠。你們年輕人難以理解……我今天的情況固然很困難，但還有友誼在，你能來我家不就是一個證明麼？」先生想了想，又說：「祖國和母親都是不能選擇的。所以，我也只有今天這樣的選擇……。」當時，先生臉上的神情令我想起了屈原的詩句：「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我選調到包鋼後曾給他介紹過那裏的情況：1975年整頓時好一些，後來又糟了。先生在1976年3月31日的信中寫道：「你問我的心情如何，這確不易描述。簡單一點，以你們包鋼的產量可以衡量。它高我也高，它低我也低。」現在，我似乎仍能感到先生那顆拳拳的愛國之心在跳動。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春天我們又見面了。先生告訴我：「『文革』前

譯的拜倫的《唐璜》有可能出版。真是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春天竟來得這麼快，出人意料。」先生說話時眯起雙眼，嘴角露出一絲微笑，憧憬着未來。

那副慈詳的面孔將永遠印在我的心裏。因為萬萬沒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幾天後，先生就因心臟病猝發而溘然長逝了！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多次在心中發出呼喊：「難道這是真的嗎？」先生長期蒙冤，背着十字架在黑暗的坑道裏走了幾十年，當他總算看見一線陽光時，竟然又被迫離開了這個世界……造物也太不公平了！

21年後的今天，痛定思痛，我常常會想到恩格斯的一句話：「由於歷史的必然性所產生的一切後果，不論多麼可怕，它自身就是一種安慰。」先生一生坎坷所帶來的遺憾，人們已經了然。但我們是否想過，不也正是這種坎坷的經歷才磨煉了他的性格，使他於絕望的季節仍耕耘不輟；能耐得寂寞，駕馭自己的才華；對祖國充滿了深沉的愛……從而成為一代中國優秀知識份子的鮮明寫照麼？想到這些，我沉重的心情才感到些許安慰。隨着時間的流逝，先生的影響日增、聲譽日隆，這種情況的出現甚至被人稱為「穆旦現象」。儘管是遲來的哀榮，但也是一種安慰。如果上述文字能有助於人們對先生的了解——哪怕只是一點點，對我來講已是最大的安慰。

孫志鳴 1950年生於天津，1968年到內蒙插隊，1983年大學畢業。現在中國冶金設備深圳公司任職，高級經濟師，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